

【论 文】

难以“同归”的“殊途”： 民国“边疆/民族”研究中的“派性”与“派系”

熊芳亮

摘要：长期以来，学界对于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有一个简单的“二元区分”：属于或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进步力量，以及属于或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势力。这种以政治或党派立场进行的区分，在分析和解读国共两党“边疆/民族”政策的不同取向方面固然有效，但在分析和解读整个民国时期、特别是“国统区”的“边疆/民族”研究时，则显得力不从心。实际上，在政治派性、政治派系和学术派性、学术派系的双重影响之下，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一直处于“派性”与“派系”的笼罩之下，“政治派”、“史学派”、“社科派”、“地学派”群雄并起，乱象纷呈。“派性”与“派系”虽然给民国“边疆/民族”研究带来了短暂、浮夸的繁荣景象，但也败坏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生态、学人风气和学科旨趣，让民国“边疆/民族”研究作茧自缚、病入膏肓，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妥善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方案或政治道路，更不可能有能力、有机会最终实现之。一批有识之士终于认识到只有打倒国民党的腐朽专制统治，打破学术研究的学科壁垒和门派之见，才能迎来“边疆/民族”研究新境界、新纪元。

关键词：边疆 民族 派性 派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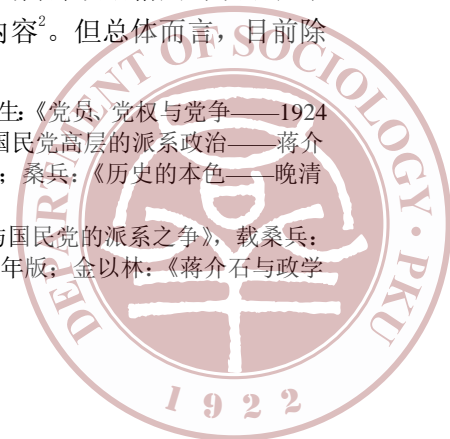
前言：问题的提出

在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堪称“显学”，不仅在学术界一度十分繁盛，在社会上也曾引起广泛关注，对民国政治也有一定的影响。长期以来，学界习惯于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进行简单的二元区分：属于或倾向于中国共产党的民主进步力量，以及属于或依附于国民党反动派的反动势力。这种以政治或党派立场进行的区分，在分析和解读国共两党“边疆/民族”政策的不同取向方面固然有效，但在分析和解读整个民国时期、特别是“国统区”的“边疆/民族”研究时，则显得力不从心：除了国共两党的分歧与论战之外，民国学界在“边疆/民族”领域无论是私下的分歧还是公开的论战，既频繁、激烈又不可调和，有的时候面红耳赤火花四溅，有的学人形同陌路、势如水火。笔者以为，深究隐藏在这些现象背后的历史原因，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论和现实价值，既能加深我们对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认识，更加明晰地了解民国时期学界的学术生态、学人的学术心态、学说的学术背景，又能管窥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由盛而衰、由“显”而“隐”的历史原因。

学界对于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关注可谓众矣，从学人、学说、学史、学科等方面的解析与解说成果既丰富又丰硕。近年来，史学界对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政治格局与政治派系的研究成果颇丰¹，其中亦有不少涉及到对民国学界、学人的部分和内容²。但总体而言，目前除

¹ 主要的论著有：郭绪印：《国民党派系斗争史》，上海人民出版社 1992 年版；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版；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9/2016 年（修订本）版；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

² 主要包括：桑兵：《国民党在大学生校园里的派系争斗》、《1948 年中山大学易长与国民党的派系之争》，载桑兵：《历史的本色——晚清民国的政治、社会与文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 2016 年版；金以林：《蒋介石与政学



了有个案式的研究之外，当今学界对民国学界内部及其与政界的恩怨、矛盾乃至冲突的关注和研究，对其“派性”与“派系”¹进行整体性、专题性、体系性的关注和研究，对其派性、派系影响、左右甚至操控民国学术走向的关注和研究，都还十分匮乏，堪称空白。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基于政治立场和意识形态的二元分野的惯性思维使然，对“国统区”内部的派系与派性视而不见；另一方面，也与所涉学人在新中国成立后或赴海外，或渡台湾，即便坚守大陆也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之下或主动或被动地与民国历史“划清界限”，或淡化（隐藏）其政治瓜葛、或删改其敏感文章²、或修正其“不当言论”与“反动学说”，使得民国时期的许多学案，直至今日仍隐晦不彰。就此而言，也就不难理解后人对于民国学界的解读和研究成果，浮于表面、沉溺表象，常常“差之毫厘，谬以千里”了。

总体而言，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经历了由“隐”而“显”、由“盛”而“衰”的成长历程³，其“盛”与“衰”基本上都发生在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因此本文研究的重点，也主要放置 1928 至 1949 年。

一、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中的政治派性与派系

党的派系化与派系的党化，是中国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时期的重要特征之一⁴。综合史学界的研究成果，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政治派系可以划分为蒋（介石）系、汪（精卫）系、胡（汉民）系⁵、孙（科）系⁶，上述派系相互之间曾激烈争夺国民党集团的最高权力。直至抗日战争爆发前后，蒋介石才集党权（中央政治委员会总裁）、军权（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政权（国民政府主席）于一身，逐步确立了其在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领袖地位。此消彼长之下，汪系、孙系的地位虽然有所降低，但仍然不失为制约、掣肘蒋系，使其不能为所欲为的重要力量。在上述派系之中，除了作为党国领袖蒋介石必须关注“边疆/民族”问题之外，孙科系对“边疆/民族”问题的关注尤为突出。作为孙中山的长子，孙科对捍卫和践行“三民主义”有着更浓厚的情节。孙科在 20 世纪 30 年代倡导成立了中山文化教育馆⁷，内设研究部和编译部⁸，研究部下设“民族”、“民权”、“民生”三个研究组，其中“民族组”延请著名学者黄文山（任组长）、卫惠林等创办了《民族学集刊》杂志（1936-1949 年之前共出版了 5 集），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力。同时，孙科在主长立法院期间，对“边疆/民族”方面的立法项目也有一定的关注和助力。芮逸夫在 1946 年当选立法委员，背后就有孙科的运作和支持。

在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也是派系林立，其中着力关注、介入“边疆/民族”研究的政治派

系》，载金以林：《国民党高层的派系政治——蒋介石“最高领袖”地位的确立（修订本）》，社科文献出版社，2016 年版。

¹ 本文所称的“派性”与“派系”，是同一事物的一体两面。“派性”，指的是民国学界在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深入骨髓的“派系”基因；“派系”，则主要指的是民国学界内部那些或隐秘或公开、或紧密或松散、或封闭或开放的各种各样的小圈子。

² 以《边政公论》为例，其中很多文章都没有被著者录入其在新中国成立后出版的各种全集、文集之中。

³ 笔者将另文专题进行分析与探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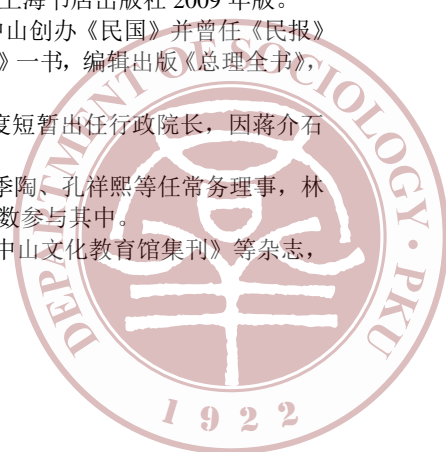
⁴ 参见王奇生：《党员、党权与党争——1924~1949 年中国国民党的组织形态》，上海书店出版社 2009 年版。

⁵ 胡汉民（1879-1936），广东番禺人。清末在日本留学期间加入同盟会，辅佐孙中山创办《民国》并曾任《民报》主编，著名的“三民主义”即出自他手。孙中山去世后，撰述《三民主义的连环性》一书，编辑出版《总理全书》，争夺“三民主义”的阐释权，成为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粤系”的领军人物。

⁶ 孙科（1891-1973），广东香山县人。孙中山长子。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曾一度短暂出任行政院长，因蒋介石作梗无奈辞任，不久后转任立法院院长（1932），并长期担任此职。

⁷ 中山文化教育馆正式成立于 1933 年 3 月 12 日，由孙科任理事长，蔡元培、戴季陶、孔祥熙等任常务理事，林森、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为理事，国民党统治集团的元老和实权人物悉数参与其中。

⁸ 编译部主任为吴经熊，曾编辑出版的《时事类编》、《中山文化教育馆季刊》、《中山文化教育馆集刊》等杂志，在民国时期有较大影响。



系主要包括：以戴季陶、蔡元培为代表的“元老系”；以朱家骅为代表的“政学系”，以陈立夫、陈果夫兄弟为首的“CC系”。

作为国民党的“右派理论家”，戴季陶一直以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继承人自居，通过歪曲、伪纂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炮制了所谓的“戴季陶主义。戴季陶顽固地“以文化定义民族的边界，以民族定义国家的边界”，主张对蒙藏地区采取“放任主义”的政策。在南京国民政府任行政院考试院院长的戴季陶，还长期把控行政院蒙藏委员会，主导南京国民政府的蒙藏事务，被世人称之为蒙藏委员会的“太上委员长”。蒙藏委员会主办的《蒙藏月刊》、《边疆通讯》、《边政公论》杂志，是民国政要和学人交流“边疆/民族”研究成果的重要平台。1932年，戴季陶创办了新亚细亚学会。在中国民族学会、中国边政学会、中国边疆学会等专业学会成立之前，以该学会名义编辑出版的《新亚细亚》期刊，是最有影响的“边疆/民族”研究领域的学术期刊之一。亚细亚学会还编辑发行了“边疆丛书”，资助出版了一大批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书籍。

同为国民党元老的蔡元培¹，对“边疆/民族”问题也颇为关注。在德国莱比锡大学、汉堡大学留学期间，蔡元培就对民族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先后发表了《说民族学》《民族学与社会学》、《民族学上之进化》等文章²。有学者认为，“民族学”这个概念的使用，始于蔡元培1926年在《一般》杂志上发表的《说民族学》一文³。蔡元培对民族学厚爱有加，曾表示要“以研究民族学终老”。创办中央研究院并任院长期间，蔡元培大力支持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社会科学研究所的建设，甚至亲自领导社会科学所民族学组（后并入历史语言研究所）的工作⁴，为两所开展“边疆/民族”方面的研究，创造了得天独厚的物质条件和研究环境。由吴敬恒、蔡元培、王云五等人主编的“新时代史地丛书”⁵，也出版了包括张其昀《中国民族志》等在内的一系列“边疆/民族”领域的译著。

“政学系”的朱家骅⁶也是热心于边疆问题及边疆研究的高官，良好的教育背景，以及其在任中山大学、中央大学校长期间深植的学界人脉，为他开展“边疆/民族”工作、推进“边疆/民族”研究创造了相当的便利条件。在任中山大学校长期间，朱家骅大力支持傅斯年、顾颉刚等人筹办《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周刊》，国内最早的人类学著作——杨成志所著《云南民族调查报告》就刊载在该刊物上⁷，开创了中山大学“边疆/民族”研究的历史传统和学术基础；在任国民党中央调查局局长期间，朱家骅在中央调查局设立了蒙藏调查室，加强蒙藏地区的情报工作；在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朱家骅专门组织召开了边疆工作座谈会，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边疆工作的谈话、讲话，还成立了边疆语文编译委员会，资助顾颉刚编辑综合性研究期刊《文史杂志》，延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顾颉刚等为其所用。

陈立夫、陈果夫两兄弟⁸所主导的“CC系”，对把持和掌控意识形态领域亦是非常上心，对“边疆/民族”问题及其学术研究也颇看重。由“CC系”所创办的正中书局，编辑出版了大量解读孙中山“民族主义”，以及边疆问题、民族学方面的书籍。1932年，陈立夫与戴任、马鹤天

¹ 蔡元培（1868-1940），浙江绍兴人。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筹建中央研究院并长期担任院长职务。

² 台湾中华书局曾汇编为《蔡元培民族学论著》出版。（台湾）中国民族学会编：《蔡元培民族学论著》，（中国台湾）中华书局，1962年版。

³ 胡起望：《蔡元培与民族学》，中央民族学院研究部，1980年9月。

⁴ 参见李济：《傅孟真先生领导的历史语言研究所——几个基本观念及几件重要工作的回顾》，载《李济文集》（卷五），第169页。

⁵ 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⁶ 朱家骅（1893—1963），字骅先，浙江省湖州人，民国时期曾在高校及学术机构（中山大学校长、中央研究院总干事）、国民党中央（国民党中央调查统计局局长、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政府（教育部部长），以及地方（浙江省省长）担任要职，在民国政界、学界颇有人脉和影响力。1949年后随蒋去台。

⁷ 《国立中山大学语言历史学研究周刊》（第11卷第129至132期合刊），1930年。

⁸ 陈果夫（1892-1951）、陈立夫（1900-2001），陈其业（陈其美之兄）之子，两人曾长期把持国民党组织及党务工作，被称为“CC系”。



等人一起创设了开发西北学会¹，出版《开发西北》刊物²。在主政教育部期间（1938-1944），陈立夫延揽著名人类学家凌纯声任蒙藏教育司司长。

除此之外，在国民党和南京国民政府的军事机构中，也设立有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专门机构。例如，参谋本部设有边务研究所，黄慕松曾任其所长；国防部二厅五处设有边务研究室等。蒋君章、曾问吾、高长柱等是国民党军事机构中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代表人物。

在地方层面，国民党的政治派系就更加复杂，势力较大、掌握较多中央权力的是江浙系和粤系³等。处于边疆地区的地方派系，如云南的龙云⁴，广西的白崇禧、黄绍竑⁵，贵州的杨森⁶，甘青的马步芳，西康的刘文辉，新疆的盛世才等地方军阀/实力派系，也曾出于各种目的以多种形式和途径资助、关注、支持过“边疆/民族”研究。

二、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派性与派系

虽然上述政治派系长期介入、关注、支持“边疆/民族”研究，但学界才是“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真正的主力 and 主阵地。民国时期，边疆多事，时局艰困，刺激民国学人对“边疆/民族”问题投入极高的关注和热情。加之抗战期间，民国学人的活动重心整体向西南、西北地区转移，更使它们有了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条件和资源。总的来看，如果暂且排除政治派系的介入和干扰，仅是以研究学术标准进行区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可以大致划分为以下几大“派系”：

（一）“政治派”。这一派的突出特点就是从国家政治的角度出发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此一派除了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要员与幕僚，也有部分学者参与其中。根据其政治立场，此派又可以区分为两大派系：一是“主义派系”，打着贯彻实施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旗号研究“边疆/民族”问题，主张根据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处理和解决“边疆/民族”问题。戴季陶、孙科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对于孙中山先生“三民主义”的认识和理解并不一致。二是“边政派系”，主要从维护国家主权（外交）、强化国民党统治（内政）的“国家主义”角度，研究“边疆/民族”问题，提出的意见建议主要集中在如何与西方列强交涉边疆领土争议，强化对“边疆/民族”地区的控制、治理、开发，如何促进各民族（宗族）的融合与同化等。朱家骅、杨森等是这一派的典型代表。

（二）“史学派”。这一派的突出特点是以史学为基础，主要应用文献考据的方法，进行“边疆/民族”研究。根据此派学者的学术背景和对待传统史学典籍的基本立场，也可以区分为两大派系：一是“传统史学派系”，主要依托传统的史学典籍、地方志、蛮夷志等史料进行“边疆/民族”研究，撰述了近代中国最早的一批“中国民族志”、“中国民族史”著作。刘师培、王桐龄、吕思勉等人，是参与其中的代表人物。另一个是“现代史学派系”。与“传统史学派系”相比，这一派系受到西方现代史学和现代社会科学的影响，对传统史学典籍、地方志等史料存在“辨识”、“辨伪”的立场和态度，对“边疆/民族”现实问题研究倾注了更多的心血和精力。傅斯年、顾颉刚、谭其骧等，……是参与其中的代表人物。

¹ 1936年更名为西北建设协会。

² 汪洪亮：《民国时期的边政与边政学（1931-1948）》，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14页。

³ 徐松石之《粤江流域人民史》、陈香林之《客家源流考》、陈序经之《蛮民的研究》等著作，都有广东省地方政府方面资助和支持的背景。

⁴ 昆华民众教育馆1930年代编辑出版的《云南边地问题研究》（上、下）得到龙云的支持。抗战期间，云南省政府在民政厅设立边疆行政设计委员会（主任是人类学家江应梁），编辑出版了《云南全省边民手册》等书籍。

⁵ 白崇禧曾任蒙藏委员会副主任。黄绍竑在任内政部部长期间，曾参与处理内蒙自治运动及新疆有关事务。费孝通、王同惠赴广西大瑶山调查，写成了《广西花瑶社会组织》一书，亦是应广西省政府邀请。

⁶ 在杨森主政期间，贵州省政府于1945年设立边胞文化研究会，并编辑出版《边锋》期刊。



(三)“社科派”。这一派的突出特点是以现代社会科学为基础,主要应用社会(田野)调查的方法,进行“边疆/民族”研究。民国时期,凌纯声、芮逸夫、徐益棠、吴泽霖、吴文藻、李济、杨成志、江应梁、李安宅、林惠祥、黄文山、卫惠林、罗香林、徐松石、陈序经、罗常培、费孝通……等许多接受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语言学、考古学等学科专业教育的学者,利用西方现代社会科学的理论和方法,积极投身“边疆/民族”研究,涌现了诸如《云南民族调查报告》、《松花江上的赫哲族》、《湘西苗族调查报告》、《客家源流考》、《粤江流域人民史》、《泰族僮族粤族考》、《中国民族的形成》、《蛮民的研究》、《花篮瑶社会组织》等一系列拓土创新、垂范后世的学术作品。

(四)“地学派”。这一派的突出特点是以现代地理学为基础,重点关注“边疆/民族”地区的地貌地质、经济地理、人文地理、人口分布、民族分类等。相对于前面的政治派、史学派和社科派,这一派在新中国成立后几乎湮没无闻、鲜有人提及,但地理学家们开创中国“历史地理学”、“人文地理学”、“边疆地理学”的学术贡献,以及他们在民国“边疆/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和地位却不容遗忘和抹杀,尤其是丁文江对西南地理及西南少数民族分类法的早期探索¹,胡焕庸²、张其昀³关于中国民族人口分布规律的发现,更是一直影响至今。总体来看,地学派有两个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中心,一个是清华大学地学系,主要以翁文灏、黄国璋、张印堂、董文弼等为代表;一个是以竺可桢为首的中央大学/浙江大学的地学系。竺可桢认为,地理学是介于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之间的交叉学科,“以自然科学为立足点,以社会科学为观察点”,与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史学等有密切的“连带关系”,并以地理学作为教育的“中心枢轴”⁴。在竺可桢的影响和带动下,中央大学、浙江大学培养了一批关注、研究“边疆/民族”问题的地理学家,胡焕庸、张其昀、蒋君章、严德一等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三、“派性”与“派系”对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影响

“派性”与“派系”在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中具有很强的“封闭性”、“排他性”,其突出表现就是在学术上、政治上的“党同伐异”。

学术上的“党同伐异”,集中体现在对其他学科门类的偏见甚至压制上。西方现代各学科(所谓“西学”)与古代中国的传统学问(所谓“中学”)之间,以及西方现代各学科相互之间在治学理念、治学范围、治学方法上的对峙、激荡、砥砺,是刺激、推动民国时期学术繁荣进步的重要原因。但无论是西方现代社会科学,还是西方现代自然科学的各学科,基本上都是在清末和民国初期逐步传入中国,在争取学人和国人的接纳和认可方面,不同程度地都存在一些“水土不服”的情况。一些民国学人虽然接受了比较全面的西式(现代)教育,甚至有较长时期的西方留学经历,但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因为一些特定原因,仍对其他学科抱有“敌意”。

傅斯年是民国学界的一位传奇人物,他与蒋介石、蔡元培、朱家骅等政界要人过从甚密,颇获倚重,曾长期担任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所长职务、主持中央研究院的日常工作,还曾代理过北京大学校长,在民国学界享有盛誉。他在推进历史学、语言学发展方面不遗余力,建树颇丰,但对民族学、人类学、社会学等社会科学,却一直存有较深的偏见甚至是敌意。在傅斯年看来,民族学“专刺激国族分化之意识,增加部落意识”,不过是“‘帝国主义在殖民地发达之科

¹ 丁文江:《彝文丛刻自序》,《地理学报》1935年第4期。

² 胡焕庸:《中国人口之分布——附统计表与密度图》,《地理学报》1935年第2期。

³ 张其昀:《中华民族之地理分布》(一)(二),分别载于《地理学报》1935年第1、2期。

⁴ 竺可桢:《中央大学地学系之前途》(1928年7月),《地理杂志》第1卷第1期。载《竺可桢全集》(1),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4年版,第588页。



学’之牙慧”¹，认为由吴文藻等人组织的“所谓民族学会”就是“一段笑话”²；不仅“此等学问”“大可不必提倡”，一向标榜“不主张政府统制学术”的傅斯年甚至还曾要求国民政府对民族学“必取一个断然的立场”³，加强对民族学研究的政治管制。对民族学的态度如此，傅斯年对人类学、社会学等学科的态度也好不到哪里去。傅斯年曾对吴文藻直陈其对社会学“所知等于零”，且对“此学”有“不少疑虑”⁴。虽然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设有人类学组（第四组），但因为傅斯年对人类学的态度颇为暧昧，并阻滞中研院专设人类学所，引起人类学组成员凌纯生、吴纯一等人的不满，吴曾当面质问傅斯年是否认为人类学为中央研究院所需要的一门学科⁵。究其关键，在于傅斯年所看重的人类学，仅限于“体质人类学”和“考古人类学”，对于凌纯生所代表的“文化人类学”方向，则以“民族学”、“地理学”之名鄙之，认为“凌主要的是一个地理学家”而不是人类学家⁶，其研究也主要属于“自然科学”而不是真正的“人类学”。

傅斯年对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等“社科派”有偏见和“敌意”，反之亦然。在“社科派”看起来，“史学派”、“政治派”对于“边疆/民族”的研究，都不是“科学的”研究⁷。青年时代的费孝通曾撰文主张，中国民族的成分和结构才是“边疆/民族”研究的“基本的问题”，各成分间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和突变”才是中国民族的“根本的事实”，所谓“政治的现象”只不过是“表面上的一些浪花”。在费孝通看来，要了解“各成分的分合、盛衰、兴替、代谢、突变”，就“势必先明了（中国民族）各成分的情形”，只有“能明了中华民族的结构”之后，“才能明了现在种种的民族问题”⁸。

政治上的“党同伐异”，则集中体现在组织人事上的笼络攀附与相互倾轧。一方面，各政治派系为争夺意识形态和边疆/民族事务上的决策权、话语权和影响力，十分注重延揽、笼络专家学者为其所用。为实现此目的，政治家们频频利用地缘纽带（家乡渊源）、师承关系（教育背景）、业缘关系（工作背景）物色可靠的辅助人选。

中央大学地学系的蒋君章进入蒋介石的侍从室工作，是“地学派”直接影响、介入国民党中央边疆事务的重大事件。蒋君章 1925—1930 年期间在东南大学（后更名为中央大学）地学系求学，其时正是中央大学地学系的“黄金时期”。毕业后，蒋君章即先后撰写出版了《中外地理大纲》（1934）、《新疆经营论》（1936）等著作，在边疆地理研究领域崭露头角，逐步得到国民党高层的赏识。1938 年，蒋君章涉足国民党军政事务，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军委政治部一厅、国民党中央训练委员会等部门工作。1941 年 10 月，蒋君章在蒋介石的核心幕僚陈布雷的举荐之下，进入蒋介石侍从室第二处工作，不久后即任陈布雷的机要秘书，成为陈布雷的政治亲信。抗战期间，蒋君章先后完成了《西南经济地理》（1943）、《缅甸地理》（1944）、《中国边疆地理》（1944）及《康藏问题论丛》初稿等著作，加上其特殊的工作背景，使蒋君章影响和地位举足轻重。在陈布雷和蒋君章的操作之下，“地学派”在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中的影响力不断扩大。在顾颉刚看来，同样毕业于中央大学地学系的张其昀创办《思想与时代》杂志、垄断《大公报》社

1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68 页。

2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768 页。

3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669-770 页。

4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二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529 页。

5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927 页。

6 王汎森、潘光哲、吴政上主编：《傅斯年遗札》（第三卷），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年版，第 1042 页。

7 费孝通：《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1934）。载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

8 费孝通：《分析中华民族人种成分的方法和尝试》（1934）。载费孝通：《怎样做社会研究》，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 年版，第 172 页。



论，背后都是蒋介石和陈布雷支持的结果¹。张其昀的表现让蒋介石颇为满意，抗战胜利后蒋介石曾力邀张其昀为其幕僚，代为文字及编辑工作，只是张因故未往而暂时作罢²。

朱家骅在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期间，利用其曾任中山大学校长职务的背景，极力笼络曾在中山大学任教的傅斯年、顾颉刚在“边疆/民族”事务上为其谋划、助力。从现有文献来看，朱家骅关于边疆问题的很多重要文稿、讲话，都是傅斯年和顾颉刚在背后参与甚至直接起草、审定的。在朱家骅的影响之下，傅斯年、顾颉刚也或多或少、或深或浅地介入到了国民党的派系政治之中。从顾颉刚的日记来看，朱家骅多次或明或暗地点拨顾颉刚在涉及 CC 系的某些人事问题上避嫌。顾颉刚不仅知悉朱家骅与陈立夫两派系之间的矛盾³，甚至还甘当马前卒，在参政会上故意质问陈立夫使其难堪⁴。顾颉刚一方面指责张其昀等人有“政治野心”⁵，认定胡焕庸等人是“CC 系”⁶，同时又自表心迹，称：“许多人都称我为纯粹学者，而不知我事业心之强烈更在求知欲之上。我一切所作所为，他人所毁所誉，必用事业心说明之，乃可以见其真相。”⁷其矛盾心态，可见一斑。但顾颉刚玻璃一般的“事业心”，很快就被残酷的政治现实所狙击。一来朱家骅并不完全信任顾颉刚，虽委以顾颉刚边疆翻译委员会副主任的职务，但主事者却另有其人，使顾颉刚心生“傀儡”之感慨⁸。加之顾颉刚与傅斯年两人早有心结，而朱家骅在一些问题上对傅斯年反而更为信任和倚重，使得顾颉刚屡屡怀疑傅斯年在其背后作梗，直以“政敌”视之⁹而无可奈何。二来顾颉刚亦认为朱家骅“不足与谋”，辅助朱家骅纯粹属于名利交换。为了争取顾颉刚“出山”，朱家骅出手阔绰，为顾颉刚所办刊物提供大笔工作经费，并资助中国禹贡学会，顾颉刚“方认彼为知己”¹⁰，最终同意赴重庆协助其工作。三则陈立夫有意给了顾颉刚一个“史学会会长”的虚名¹¹，顾颉刚受宠之余不仅未推辞反而认为“使教部肯出钱，许做事，则我担负其责固无可”¹²，成功离间了本就不太牢固的朱、顾关系。朱家骅与顾颉刚各取所需的短暂合作，也就此画上了一个不太圆满的句号。

四、几点思考和结论

从上面的分析我们看出，政治上的幕后操控，专业上的门派之见，观点上的互相攻击，人事上的党同伐异，“派性”与“派系”与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可谓如影随形、伴随始终，是后人照亮民国学界阴暗历史的火把、开启民国学术大门的密钥。

“派系”与“派性”在民国“边疆/民族”研究领域横行无忌，既有政治方面的原因，也有

¹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2页。

² 1949年6月，张其昀渡台后，即受到蒋介石的重用，任其为国民党总裁办公室秘书组组长，其后更是屡获重用，在台湾权倾一时。

³ 蒋介石刻意陈立夫与朱家骅两派系之间玩谋略、搞平衡，两人两次互换“教育部长”与“中央组织部长”之职，两派人马亦随之互遭清洗。

⁴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53页。

⁵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02页。

⁶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8页。

⁷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89-690页。

⁸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0页。

⁹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1页。

¹⁰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四），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10页。

¹¹ 未明所以的顾颉刚在惊喜之余，还揣测是蒋委员长给教育部“发条子”“举我之名”，所以“彼辈不能不推我出来”。参见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页。

¹²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0页。



学术自身的问题。就政治而言，在民国时期派系政治与派系斗争极其复杂的时代背景之下，象牙塔内的学术界自然也难以独善其身、孤芳自赏。一方面，国民党内部各种政治派系要争夺意识形态领域的话语权、“边疆/民族”事务的决策权，势必需要控制相关高校、科研机构，笼络、驱使相关学者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存亡绝续的艰困时局，使民国时期众多学人自觉不自觉地身怀“救世”、“救国”的理想与使命，有的还有“学而优则仕”的政治抱负，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政治漩涡，难以自拔。除了来自政治方面的原因之外，学界自身存在的“派性”与“派系”对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同样有着十分重大且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民国学界对于中国的前途和命运有着各不相同的认识与看法，开出的“药方”大相径庭：有的要“复古”，有的要“西化”；有的要“自由”，有的要“独裁”，……各执己见、针锋相对。另一面，社会学、人类学、地理学、语言学、地理学等西方现代学科在民国时期大批传入中国，古代中国的传统学问（“中学”）与现代学科（“西学”）之间的关系，接受传统教育与有留洋背景的学人之间的关系，都还要相当的时间进行调适和磨合。

“派性”和“派系”，既是刺激民国“边疆/民族”研究表面繁荣的兴奋剂，也是扼杀民国“边疆/民族”研究创见与活力的慢性药。从积极的方面来看，“派性”和“派系”的相互竞争、砥砺，在学术上刺激、繁荣了民国时期的“边疆/民族”研究，加深了国人对于“边疆/民族”问题的了解和认识，在政治上对蒋介石统治集团错误的“边疆/民族”政策也起到了一定的牵制、制衡作用。从消极的方面来看，“派性”和“派系”的急功近利、相互倾轧，在很大程度上也固化了学人的门派之见，助长了追名逐权的学术风气，败坏了民国时期的学术生态，遏制、扼杀了民国时期“边疆/民族”研究的学术活力和创造力，最终不可避免地沦为政治斗争的工具和牺牲品。总的来说，在民国“边疆/民族”研究的诸派系中，以戴季陶、陶希圣代表的“政治派”、以顾颉刚、傅斯年为代表的“史学系”、以胡焕庸、张其昀、蒋君章为代表的“地学派”，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国民党统治集团各政治派系的接纳和青睐，而“社科派”则在政治上和学术上受到了来自蒋介石统治集团和其他学术派系的双重压制和遏制，相对疏离、游离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及其各政治派系之外。这也就为新中国成立后“政治派”、“地学派”、“史学派”逐渐淡出“边疆/民族”领域直至销声匿迹，“社科派”则逆势而为实现“触底反弹”，埋下了历史伏笔。

“派性”与“派系”的肆无忌惮，决定了民国“边疆/民族”研究的所谓“繁盛”，只不过是特定时代背景之下的一种“假象”和“幻景”，根本不可能找到一条符合中国国情、妥善解决“边疆/民族”问题的学术方案或政治道路，更不可能有能力、有机会最终实现之。顾颉刚抱着“救国”的事业心涉足国民党的党政，到头来却被残酷的现实作弄，灰头土脸、头破血流。“政学两界不能作事”¹的窘境，竟使顾颉刚一度心生从商之心，民国学术生态之恶劣可见一斑。“学界争名太甚”、“政界争权太亟”²的残酷现实，终于使一部分民国学人渐渐清醒过来。他们有的在政治上对国民党统治集团的腐朽专制统治心灰意冷，积极加入民主党派，渐次向中国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民主阵营靠拢；有的则在学术上逐渐注重打破专业壁垒，去除门户成见，汲取众家所长。伴随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边疆/民族”研究也即将迎来她的新境界、新纪元。

¹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271页。

² 顾颉刚：《顾颉刚全集·顾颉刚日记》（卷五），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64-65页。

